

第一章 偏师挥戈，拉开长征序幕

博古召见，寻淮洲瑞金受命

1934年7月初 夜幕笼罩 战马嘶鸣。

在福建连城通往江西瑞金的山间小道上，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手持火把，正在匆匆地行进着。

队伍急速前移，火光随风摇曳，黑暗中宛如一条飞舞的火龙。

这支队伍就是连日来正在闽西同敌鏖战的红军第七军团。几小时前，他们突然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十万火急电令：立即脱离战斗，火速赶回瑞金。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年轻的一个军团，它的组建源于1933年9月的黎川之战。

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结合部，也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会合点。

蒋介石为“铲除”中央苏区 第一步棋便是要夺下黎川县城。为此，他派出了陈诚的三个精锐师——北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推进。

大敌当前 要不要守黎川城 中共内部发生了分歧，博古等

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则主张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黎川前线军事负责人肖劲光赞同毛泽东的看法，他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

然而，毛泽东和肖劲光的意见丝毫未被考虑。肖劲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敌周浑元三个师兵临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个星期，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却全被博古调走，第十九师赶往福建，另一个独立师参加硝石战役，肖劲光麾下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员。

肖劲光是一位有着多年战斗经验和丰富阅历的将领。他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党代表。1930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曾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在反“围剿”战争中，他很快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要更适合中国国情。眼下，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知道惟一的选择便是撤离。

不日，肖劲光在无法“死守”的情况下，率教导队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

肖劲光这迫不得已的一退，却被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斥责为“不战而弃”“仓皇撤退”“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

而《红色中华》更是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肖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

不过，斥责归斥责，曝光归曝光，在七十人抵挡三个师的严峻事实面前，若要“问罪”，肖劲光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肖劲光被召回瑞金接受任务。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把小团小师整编成大团大师正规部队的决定，肖劲光奉命以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他所领导的闽赣军区为基础，组建红七军团。

1933年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委，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师就是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 师长周建屏；二十师为闽北红军 师长黄立贵；二十一师是建黎太警备区的红军，师长由肖劲光兼任。

红七军团组建后所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钳制金溪方面的敌人，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打黎川外围据点浒湾。

浒湾位于抚州东南，驻有敌军主力两个团，周围集结有敌军十几个师，而红七军团这时只有第二十一师在江西，兵力总共只有两千余人，还不到敌人的两个团。在这种情况下，要去攻取浒湾，无异于飞蛾扑火但这是中革军委的命令，不打不行。

11月10日上午，红七军团被迫向浒湾发起攻击。敌人获悉浒湾被攻，急令金溪之第四师沿金抚公路出援。红七军团顿时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然而，中革军委仍要他们坚持到红三军团主力赶到，再向敌人发起总攻。

战斗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坚持到了第三天，部队已减员过半 而敌人却增派了飞机和装甲车助战 结果 阵地被突破了。

浒湾一战 肖劲光非但没有“将功补过”相反 又吃了一个败仗。

黎川失守 浒湾失利 接连两次“败绩”肖劲光终被“左”倾中央领导者找到了“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的借口。

1934年1月4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实行公审。

公审规模之大，气氛逼人，在中央苏区还是头一次。参加大

会的有中央和各后方机关代表、群众近千人一阵口号后，书记员宣布了对肖劲光的控告书，其“罪状”有二：黎川失守，浒湾战斗“丢伤兵”。

公审前，军事法庭并未进行预审，所以肖劲光不知何罪之有。

读毕控告书，执行主席问肖劲光有什么可说。肖劲光大惑不解，当众为自己辩护：“从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先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还让我去组建七军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失败。现在为何又以黎川失守为题呢？”

执行主席又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劲光继续辩解道：“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只有七十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得住？况且，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原告插问道。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即使群众发动起来，赤手空拳又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武装的敌人……”

肖劲光理正词严，大会执行主席无话可问。

至于丢伤兵的事，肖劲光继续辩解：“八角亭战斗我们伤亡了三百余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这三百余名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根据地。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而其他大部分伤员在我部队的掩护下，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

经肖劲光这么一说，两条“罪状”都不成立。开始时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也不再作声了。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最后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肖劲光被判刑，红七军团领导人也随之作了变更。寻淮洲继续任军团长，乐少华接任政委，同时调来的还有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

改组后的红七军团基本上处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在寻淮洲的率领下，经过实战的锻炼，很快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游击战、运动战的劲旅。不过，由于连续作战的消耗，部队在此次接到“回师”命令时，全军团只剩下四千余人。

四千人的队伍星夜兼程，杂乱的脚步声踏破了黑夜的寂静，但却干扰不了军团首长的忧虑与沉思。

几个月前，蒋介石鉴于连续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特地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为他出谋划策，发誓要消灭红军，踏平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和他的顾问认为，国民党军过去历次“围剿”之所以屡遭挫败，并非兵寡力弱、装备低劣，而在于“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法不当和军事指挥不得宜。有鉴于此，蒋介石特在南昌行营召集五省驻军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战术，即采取“严密封锁，发展交通，注重机动”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实行以守为攻，稳扎稳打；以实击虚，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纵深配备，薄守厚援；对峙则守，层层巩固，得隙则攻，节节进逼等战术原则。

为使部队适应苏区山地作战需要，蒋介石还将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两团或三团的部队改编为每师直辖三团，团以下各级加以充实，达到轻便灵活，利于指挥，保持战斗能力。团级以上单位增加侦察队编制，以刺探消息，灵敏耳目，并扩大运输队编制，充实输送能力，保证部队给养。

蒋介石为了贯彻其新的战略战术，同时也为了消除官兵中

因第一至四次“围剿”失败而产生的惧怕红军的颓丧心理，树立所谓“剿匪”必胜信念，还聘请了一批德、意、美高级军事顾问，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轮训驻赣部队少尉以上军官。训练时，编印数种“剿匪”教材，发给每个受训者。蒋介石还亲自上课，宣扬其“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之论调。德、意、美军事顾问和教官则讲授“剿共”军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达到所谓增强体力，完善技能，提高战斗力之目的。

在经过半年多的充分准备之后，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从容地调集了五十万兵力，一百余架飞机，从东南西北四面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与此相反的是，在中共内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被完全排斥。“左”倾领导人完全控制了中央各部门。

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把持下，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以堡垒对堡垒”等一整套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

在“左”倾领导者看来，这次反“围剿”战争，是“国民党政权同红色政权的决战”，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在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主观主义地轻视敌人，错误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运动战，主张阵地战。致使几个月间，红军损失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苏区周围，国民党重兵压境，并不断地向苏区中心步步进逼，军事形势已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

“局势险恶若此，该不会是瑞金方面有什么闪失，调我们去

增援吧？”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悄悄地向走在一起的参谋长粟裕问道。

“大概还不至于”一向对情况判断很准的粟裕回答说。

不过 粟裕内心明白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 中央苏区连连丢城失地，无数战士血洒沃野，无辜群众惨遭杀戮，红都瑞金虽然暂时还是安全的，但整个战场的情况却是十分险恶了。特别是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后，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林彪、寻淮洲、罗炳辉分别率领的红一、七、九军团 在福建建宁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二路军六个师拼杀一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敌刘和鼎部的第九纵队四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红军连连失利，苏区日渐缩小。

照这样发展下去，瑞金的闪失，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一路上，军团几位主要负责人各有各的猜测与困惑：“回师瑞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在他们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谜底终于被揭开了。

是日晚，军团的领导意外地受到了中革军委几位主要领导人，特别是那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接见。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 德国人。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后，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 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曾在德共中央机关从事过情报工作，并两次被捕入狱 1928年4月越狱后到苏联，化名巴

格奈尔。次年春，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受派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李德动身来华时，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他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到中国东北与日本人打交道比较方便。他在哈尔滨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上海，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联系上了，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并与中共临时中央有了联系。

博古与李德在莫斯科时就已相识。他请求李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的军事顾问。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时，博古和张闻天又提出要李德同行前往，以军事顾问身份到中央苏区工作。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电告莫斯科，并得到了批准。

不过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李德本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然而，他一到瑞金，便在博古、洛甫的极力推崇下，总揽“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的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几项大权，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之上的“太上皇”。

这也难怪，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又要独揽大权，只好仰仗这位“洋顾问”了。这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独断专行。

担任过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像这样的人，平时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拿红军指战员的生

命当儿戏，动辄逮捕、枪毙。一些红军指挥官给他打电话他都不肯接，更别说见面了。

可这次，李德的表现却异乎寻常。红七军团一到，军团首长风尘未洗，便被集体召到“独立房子”的会议室里。

“独立房子”位于下肖中央局对面的田段中，两间一厅，约一百多平方米，这是博古下令专为李德修建的。

“独立房子”灯光摇曳。博古召集的中革军委扩大会正在此进行。博古很推崇洋顾问，军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常常搬到李德住地来开。

党中央及中革军委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及红七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等。

李德是一位“图上指挥家”。说话时总喜欢借用地图勾勾画画，指指点点。

这次也不例外。会议一开始，李德便手持指挥棒，在选好的一幅地图前站定，先就目前的苏区局势及军委的战略意图作了一番简要介绍。他说，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及军委经研究决定，派遣两支部队向外出击：一支是红军第六军团，由肖克、任弼时同志率领，从湘赣边出发向西挺进，打到湘贵边与贺龙同志的红军第二军团会师；一支是红军第七军团，由寻淮洲、乐少华同志率领，从瑞金出发，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到皖南，再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第十军会师。

顿了顿，李德习惯地举起手中的指挥棒，在闽、浙、皖、赣几省的地界上画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停在图上标示的皖南地区，重重地敲了几下，然后侧身望着寻淮洲等军团负责人，嗓音略有提高地说道：“这次召你们来，任务有两个：第一，皖南几个县的群众正在举行武装暴动，需要你们火速赶往支援；第二，现

在的形势，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小日本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吞并了东三省，侵占了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在准备进攻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他们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对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步骤不仅是侵入华南的第一着，而且是以后直接武力干涉中国苏维埃的准备”。

李德愈说愈激愤，语调也逐渐高亢起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间断侵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曾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下了对日宣战的紧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次，军委决定，指派你们红七军团立即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经闽浙几省北上，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最后目的地是皖南，军团原职务不变，一个半月之内，必须赶到皖南！随着那只毛茸茸的大手有力地向下挥，李德结束了他的讲话。

接着，博古代表中央及中革军委就红七军团的作战任务及行动计划等具体事项作了进一步的传达和交代。

博古时年二十七岁，年轻、俊秀，身材修长，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看起来颇有点温文尔雅的样子，他说：

“对于这次行动，党中央、军委非常重视，派你们到蒋介石的腹心地区去行动，任务是艰巨的，但你们必须努力做到：

“第一，最高度地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

“第二，最高度地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第三，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

“第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

到其后方去。

“对于这次行动的预定计划，军委考虑：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延平间之闽江地域。七军团于7日晚由瑞金出动，约12日到达连城之北，在该地域相机协同红二十四师突击连城之敌。在向永安东南前进中，应相机消灭敌人第八十师及第三师一个团在运动中的部队，并应与独九团取得联络，然后经尤溪之东，约于25日到达闽清以西的地域，并即侦察北渡。

“第二步是渡过闽江后，经由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当经过古田、屏南、寿宁时，应与福宁各属及政和游击队取得联络，并应巩固这一地区，尽可能与我闽北的部队特别是建瓯河西之五十八团设法取得联络。在到达浙境后，应与我红十军保持经常的联络。8月中旬，七军团应抵杭江铁路之兰溪地域，同时应派出别动队在广大的地段上破坏敌人的铁路，并在有利的条件下，七军团得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上的敌人。

“第三步是要在8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的根据地。你们的行动得依情况的变化由军委的电令决定之。如联络中断时，则应独立机断地行动。”

稍顿，博古又接着补充道：“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中央已令红九军团专程由江西东进到闽中北地区护送你们，届时，希望你们与九军团保持不断的无线电联络”。

军委会上烟雾缭绕，烟客们抽的都是当地的晒烟，又辣又浓，特别是洋顾问李德叼着一只烟斗，不停地吞云吐雾，呛得周恩来等少数不吸烟的人连连咳嗽。

会议一直进行到东方发白，与会者一夜未眠，眼睛里布满着血丝。

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给红七军团发出作

战训令和政治训令，并一再强调。抗日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深远后方，宣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你对这次任务怎么看？”领受任务回来的路上，政治部主任刘英故意拉着粟裕走在后头。见政委乐少华走远了，便急不可待地问道。

粟裕皱了皱眉头，说：“要命！”

更深的话粟裕不好往下说了。他心里十分明白，在红军已经全面被动，战斗力已十分弱小，中革军委又指挥失当，而蒋介石已在军事上占有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红七军团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是啊，如果这个任务是放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部署执行，他们谁也不会感到疑惑。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发生之时，毛泽东就曾详尽地分析过当时的敌我态势，并建议：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以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彭德怀、周恩来亦有过相似的建议。

彭德怀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第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支援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这样，

可收一石数鸟之效。

周恩来也以红一方面军总部名义 致电博古、李德、项英 通报福建事变后的敌情变化，建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出动，侧击国民党军人闽部队。

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建议却遭到了博古、李德的严词拒绝和指责。

博古说：“打到外线去 打到闽浙皖赣边 这不是置中央苏区于不顾吗？瑞金还保不保了？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李德更有‘高见’：“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 比蒋介石还坏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结果，毛泽东的建议被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样也被拒绝了。

军事行动讲究的是捕捉时机无论是毛泽东或彭德怀的外线出击，抑或周恩来的内线侧击，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支援十九路军。而博古、李德却不愿介入这场‘军阀混战’更不愿替蔡廷锴去打蒋介石。在他们看来，蒋介石是大军阀，十九路军是小军阀，出击大军阀就等于帮助小军阀，作小军阀的挡箭牌结果良机坐失，把现成的盟友十九路军推向了失败的道路。

现在，当蒋介石已从容调转枪口，倾全力四面攻打红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红军越来越被动之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却作出了将红七军团远调入皖作战的决定，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为了执行抗日先遣队的特殊任务，红七军团在休整期间，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全军团约六千余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以原第十九师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三个团为基础 扩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

均以“三三”编制。

部队番号改了，但仍为第红七军团编制。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中央代表曾洪易。各部名称及职责为：

军团参谋处，有参谋三名及见习参谋四五人，一个通讯主任，两名文书。参谋赵春和负责行军路线、教育、作战，参谋张新华负责情报，参谋王××负责后勤。

政治部辖组织科、宣传科、地方工作科，组织科负责党内组织，宣传科负责写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

保卫局，局长周群，有保卫干事几名，负责肃反及处决民愤大的反革命恶霸。

供给部，部长刘达云，下设军需主任及军需员。

卫生部，部长谭志刚，有医务主任、十几名医生及二十余名护士。下辖担架连，约一百六七十人。

所辖三个师的情况为：

第一师师长胡天桃、政委李仕元分别兼任五十五团团长、政委，该师战斗力最强，是军团中的主力。

第二师师长王裔三、政委李世清分别兼任五十六团团长、政委。

第三师师长王永瑞、政委钱琪柱分别兼任五十七团团长、政委。

此外，每师配有一个直属重机枪连（包括一个步兵排）、一个侦察排、一个通信排、一个传令排、一个担架队和一个宣传队。

1934年7月6日，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全军将士精神抖擞，戎装待发。

出征前，军团在瑞金叶坪召开誓师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检阅了队伍，朱总司令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我们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农子弟兵，我们

的任务就是保卫中华苏维埃政府，保卫人民的利益，保卫全民族的利益。我们用什么来保卫呢？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全国工农大众和一切进步的爱国人士的拥护，我们手中有枪杆子，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我们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动员民众起来革命，反对国民党压迫工农和屠杀人民，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我们坚决为抗日 保卫民族独立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军队一枪不放，把三省退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又调集百万大军来打我们共产党、红军蒋介石不抗日，我们红军去抗日！”

总司令慷慨激昂的讲话，铿锵有力，激起大会雷鸣般的掌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华民族！”等口号响彻云霄。

是日晚，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披着星光，在苏区人民的依依惜别声中，告别红都瑞金，旌麾东指，踏上了新的征程。

毛泽东宣言 北上 为了抗日

按照中国共产党公开的说法，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与福建的进攻，为了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与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 为了揭破“红军捣乱后方”“中国无力抗日”等国民党的宣传，从中央苏区派出的一支担负着特殊任务的先遣部队。

当时，中共中央直接交给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

- 1 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游击活动，并在敌人最受威胁

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必须在党的彻底地武装群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各种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战争。

3. 要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地表明自己是有组织的、英雄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

4. 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5. 为着保证伟大的政治的军事任务的完成，先遣队必须最高度地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觉悟和政治水平，提高与巩固部队的纪律，应该不倦怠地吸收积极的革命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 在胜利的作战中扩大自己的部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为了使先遣队的行动更加师出有名，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这个宣言称：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我们的东三省，侵占了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夺取了我们的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对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盗匪们的屠杀、奸淫、剥削与蹂躏。而国民党蒋介石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却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

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 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与福建省。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们在“无力抗日”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银元，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

.....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即一、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二、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群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同一天，先遣队在对外宣传报道时，也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宣言：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选遣队！

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我们的东三省，侵占我们的热河、内蒙古，夺取我们的华北，与我们的华南的福建省，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屠杀我们的同胞，奸淫我们的母妻姐妹，掠夺我们的财产，把我们当做奴隶牛马！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与福建省。我们反对这些汉奸